

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

——一个长期和历史的视角

北京大学 付雪晴*

2014年9月10日,匹兹堡大学的 Thomas G. Rawski 教授访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我有幸与 Thomas G. Rawski 教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深入交流,并聆听了他为朗润新结构系列活动做的演讲报告。本文将“如何从一个长期和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发展”为主题来阐释 Thomas G. Rawski 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观点。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的维度出发。首先是制度,目前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着眼于制度的研究,而历史学家则渐渐放弃了对这个维度的关注。其次是开放程度,不仅仅是贸易和资本层面的开放,而且包括思想市场的开放。同时,政府的角色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此外,企业家精神以及私有经济的兴起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最后,(广义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是中国最特殊的优势。

强调这几个关键维度的同时,还应该思考历史是如何影响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建立一个长期的历史视角的重要性。比如,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而这一套人口管理方式是基于清代的保甲制度,同时对韩国(hojok)和日本(koseki)也产生了影响。再比如,中国相比于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呈现出更严重的季节性波动态势,这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两会时间)有关,但同时也与中国投入过多的廉价资本到国有部门有关,而后者则有深远的历史成因。此外,在公共管理部门,相对于美国用严厉的制度体系来约束官员的行为,中国倾向于倡导贤能治理,任命高尚的贤才并给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这个分野与儒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何中国能在1980年代后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以及为何是1980年代而不是其他时间。众所周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但是在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当时,不仅大部分的中国民众食不果腹,陷于贫困之中;而且,工业产品由于质量低下无法销售到OECD国家。同时,新中国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政治隔离,中国官员普遍缺乏对于基本国际社会经济形势的了解。然而,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改革成果显著,使大约5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一特殊的现象给经济史研究学者带来了很

* 付雪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fuxueqing93@gmail.com。作者在 Thomas G. Rawski 教授的授权下,基于朗润新结构的讲座,同时将个人访谈中涉及讲座内容的部分糅合在文章中。

大的挑战——要么是传统的世界银行关于发展的看法存在纰漏,要么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有关发展的标准解释框架中,并未包含一个重要的元素——人力资源。这里所讲的人力资源并不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视角。它包括读写能力、算数能力、复杂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以及可用的商业工具(包括合同、国外汇票、汇款等等)。

举例来说,2010年的纽约时报中有一篇中国人重塑“意大利制造”的报道,其中提及“中国人正通过意大利的游戏规则打败意大利人——避税和巧妙地在恶名远播的意大利官僚制度中游走——从而形成一个兴旺的产业,虽然大部分是地下的。”文章中还引用一位纺织品厂家的老板的话——“中国人很聪明,不像其他移民,比较迟钝。”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农村的管理能力之高使得中国的乡镇企业在“缺乏”足够的专业管理和会计人才的情况下实现了1970年代经济改革后的繁荣发展(乡镇企业数量从1976年的约110万跃升至1986年的近1200万)。

要试图理解上面两个例子中的背后成因,应该着眼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企业家精神。虽然历史上的中国商人地位并不崇高,但中国却有深厚的经商文化。不论在东南亚国家还是欧洲国家,中国人的生意都做得非常不错;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更加是商业繁荣的典范。在美国也是如此,中国华裔的平均收入高于白种人的平均收入。正如Tim Wright所言,二战之前的中国有着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即便是一些小规格的企业家的资源,即“an abundance of small-time entrepreneurs”(Wright,1981)。此外,越来越多的有着海外教育背景和国际经验的一流的企业家不断地在中国涌现。2000—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每1000人中的微型、小型以及中型企业数量至少是61.6,远高于斯洛文尼亚、波兰等国的水平。

回到之前所提及的问题:如果中国当前的经济腾飞是由于丰富的人力资源的支持,而且这种人力资源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据,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一巨大的潜能仅仅在大约1978年后才开始实现?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没有发生?为什么在共和年代(1912—1949)或是晚清时期(1870—1910)没有发生?

在清末时期,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开放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非常活跃,同时大量的工程和管理技术流入国内。更有利的条件还包括:有机会向满洲里这个肥沃的土地迁移人口,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平稳政治格局等。但是,当时存在着各种制度上的障碍:比如在思想上没有意识到发展经济的绝好机会,同时政府收入也并不是以支撑大力进行经济改革的需要,在政治上也没有可以执行经济改革的框架,更重要的是以纽带关系为基石的经济模式严重阻碍了创新的动力。随着1978年的经济改革的推行,以上的障碍被逐一弱化,因此造就了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的现象。

比照晚清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的异同也可以看出,历史视角确实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洞见。虽然两者存在很多差异:比如现在的中国更看重增长而非仅仅关注于片面的稳定;同时现在中国的精英构成更加多样化,并不仅仅被意识形态所驱动,而且受到物质利益的吸引等。但是,现在的中国与晚清时期一样都有一个由一小部分精英统治的威权政府——1880年

的晚清仅有 2622 位宫廷臣官,相对应的 1997 年的现代中国也仅仅有 2400 名省部级干部。与晚清一样,现在的中国也缺乏对权利的监督与制衡的机制,在开放这个议题上游走不定,更多依赖于人治而非法治,对于产权的保护更多依赖于关系网提供的保护伞(patronage economy)。此外,现在的中国与晚清一样,都存在着收入的高度聚集。

从标准的制度框架来看,以上特征都显示中国的制度建设仍相对薄弱,在私有化、法制系统的发展、公司治理、金融体系、政府结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腐败等问题方面,仍有亟待提高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制度的薄弱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因为处于改革的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这些薄弱的制度的存在恰恰是使整个体系能够平稳运行的核心动力。

举例来说,现在中国的改革日程将很多 15—20 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口号作为目标——增强市场力量,提高开放程度和竞争力,对银行和金融系统进行商业化改革,降低国有经济部门的规模 and 影响以及控制寻租行为等。其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些改革目标与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规则产生了冲突。比如说,在人才的聘任方面,中国试图用考试和文凭来考核选拔人才,但实际上“搞关系”的行为使得以上政策的效果被削减。再比如说,国家层面的政策系统地支持开放,但是在微观层面的个人决策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才有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图突破重围的尝试,这与 35 年前的经济特区建设如出一辙。

但一个需要警醒的问题是,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快速发展,但是却花费了巨大的成本。剧烈的季节性波动造成了闲置资源的浪费,对于国有经济的偏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服务产业的垄断地位(比如银行、保险、航空、电信等)人为地增加了成本并降低了生产率的增速,寻租和资源流失的现象加剧了不平等。同时,现阶段的改革进程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进行结构不平衡调整、治理污染、防止不平等恶化的前提下,如何遏制官员的违法行为?但中国总体而言还是有更大的增长潜能的——中国增长势头强劲、有经历经济打击的经验、非常专注于经济增长的议题、丰富的人力资本、大胆的政策倡导、规模经济等等。

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繁荣给世界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事实,中国的发展经历也给经济理论提供了更大可供开采的金矿。不幸的是,现在很多的研究都忽视了历史的相关性。未来与中国相关的问题的研究还将继续保持其重要性,但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应该从一个长期和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发展,而不是仅仅着眼于 1949 年以后的中国(Brandt 等,2014;Rawski,2011)。

参考文献:

- Brandt, Loren, DebinMa and Thomas G. Rawski, 2014,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2(1), 45–123.
- Rawski, Thomas G., 2011, Human Resources and China's Long Economic Boom, *Asia Policy* 12(1), 33–78.
- Wright, Tim, 1981, Growth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al Industry: An Analysis of Supply and Demand, 1896–1936, *Modern China* 7(3), 317–350.